

（二〇二〇年九月七日出版）

本期目录

【风雨人生】	父亲陆平三十六年的沉默	陆 莹
【史海钩沉】	陆平、彭珮云是怎么“解放”的？	钱 江
【动乱年代】	南开大学文革往事	魏宏运
【往事非烟】	大水冲了龙王庙：南开大学红卫兵与“伍豪事件”	David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风雨人生】

父亲陆平三十六年的沉默

• 陆 莹 •

2002年12月12日，父亲走了，带着对生活的眷恋和些许的遗憾走了。

父亲走的那天正值隆冬。前来与他告别的人很多，有“一二·九”时期的老同学，平西、平北根据地时期的老战友，青年团工委时期的老同事，新中国成立后他所工作过的铁道部、北京大学、航天工业部以及全国政协的老战友、新老领导。许多重要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父亲的离去，也表示了深切的慰问。

◇ “我不相信他们搞的这一套是马克思主义的”

父亲的革命生涯不算短。从1933年参加革命，经历过著名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到过延安，又在平西、平北抗日根据地进行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共青团、铁道部、北京大学、航天部、全国政协工作过。父亲的职位不算高，新中国成立初期当过铁道部副部长，后来曾任全国政协第六、第七届常委。但是，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的一张《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大字报和此后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发表，引发了中国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得时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的父亲陆平，一时间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并且使他和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永远地连在了一起。父亲是知识分子，他的一生有60年在同知识分子打交道，而他在北大的经历，主要是见证了党在一个时期对国内基本矛盾认识上的偏差和对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地位作用的判断上的某种失误。

作为“文化大革命”首当其冲的一位当事人，父亲对“文革”的感受比一般人要深。在我们孩子的眼里，“文革”前的父亲，年轻，有知识，有文化。他任铁道部副部长的时候只有40岁，意气风发，敢作敢为。父亲的不少老同学、老同事因为他从“一二·九”运动时

就表现出的在重大问题上敢于直言的性格，而呼他为“大炮”。但是，“文革”以后，父亲变得更善于理解别人的痛苦。他对重大问题不轻易向外人表态，每每带着我们去看望的人，大多是身不在重位、命运也不尽顺利的老同志。对于“文革”，特别是“文革”中的揪斗、吊打，父亲几乎从不提起，家人也尽量回避这个话题，因为任何一个细小的话题都可能触发大家的伤感。但是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对“小卡”。父亲常常提起小卡，从“文革”一直到去世，小卡和它的故事时常挂在父亲的嘴边。

小卡，其实是北大生物系喂养的一只狼狗。1969年，父亲被下放到江西鲤鱼洲北大农场监管劳动，学校的教职员和劳改队的“走资派”“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等，都被下放到这里。那时，父亲已经是近60岁的人了，白天仍要下田、挑河泥，干比别人更重的农活；晚上，还要写交代材料，有时还要接受批判。虽然父亲也能感到“黑帮”难友的一些关爱，比如在挑河泥的时候有的教员默默地少加半锹泥，但他始终处在严密的监管之下，没有什么人可以与他交流，他身心极度劳累。在长期超负荷劳动和精神摧残的压力下，父亲终于病倒了。1970年7月的一天，正逢农场“双抢”，父亲因感冒带着39摄氏度的高烧，突发心脏病，昏倒在住着20多人的通铺的铺底下，人事不省，只有两条小腿露在床外，被当地一个小孩发现，有人叫来医务人员打了强心针，第二天才被送往南昌医院抢救，因为走得急，鞋也没顾得上穿。在医院没有人照料和陪伴他，甚至没有更多的治疗。心肌梗死使他处在半昏迷状态。同屋的4个病人，有两人走了。父亲的病情最重，当时下了病危通知，他却奇迹般地度过了危险期。在他病危的时刻，他托人给母亲捎话：你和孩子们千万不要来看我，不要受到我的牵连。父亲这场大病尚未痊愈，就又被送回农场，时时发作的心绞痛使他抬头、低头都很难，回头更做不到，一旦转身就会晕倒。于是，他整天拖着把小椅子，去做他本已不能做的那些事，感觉要昏倒时，就顺势倒在椅子上。回农场没有几天，监管人员就通知父亲参加“五一六”批斗大会，并把他作为批斗主角，大会批，小会斗。父亲的身体更加衰弱，再难下大田劳动，于是被安排到鸡场养鸡。就是这个时候，小卡来到父亲身边。

小卡原本是一只既可以看家护院，又可以做实验的狗。在鲤鱼洲，因教学早就停了，人人都在忙着“改造”自己，小卡便过上了自由幸福的生活。小卡原来活动在打谷场和伙房一带，鸡场离伙房只有一路之隔。父亲在造鸡舍时，也为小卡盖了个窝，这样它既能保护伙房，又能保护鸡群，每天的饭食也由父亲喂它。从此，小卡和父亲最亲。

农场一共有14只鸡。因为鲤鱼洲常有黄鼠狼和野猫出没，为了防止不测之灾，父亲十分警觉。他还以他知识分子的智慧立了一本“鸡蛋账”，详细记录各窝有多少只鸡，几公几母，每天产多少枚蛋，孵多少只小鸡，几公几母在一起是最佳搭档等等。小卡非常尽职尽责，夜里十分警醒。自从小卡来了以后，鲤鱼洲的黄鼠狼就再也闹不起来了，鸡场的鸡从此没有死伤。在父亲和小卡的精心照料下，鸡繁殖得很快，不到一年，已有137只，鹅也发展到10只。

俗话说，狗通人性。日子久了，小卡和父亲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父亲走到哪儿，它就跟到哪儿，永远昂着头，从没觉得父亲是“黑帮”而低人一头。江西秋冬的夜晚是很冷的，父亲从冬到夏只有一条薄被。夜晚，小卡紧贴着父亲，用自己的体温温暖父亲冰冷的心。父亲有时会潸然落泪，感慨人与人的关系还不如他与小卡和这些鸡鹅的关系真挚可靠。

回到北京后，小卡又被分回生物系，父亲无法去看它。一天，小卡在图书馆附近发现了父亲，远远地飞奔过来，站立着和父亲相拥在一起。而后，小卡一路跟着父亲来到燕南园51号。那是父亲从鲤鱼洲回京监管劳动期间的住处。此前，母亲因精神和生活劳动压力脑溢血偏瘫在床，学校允许父亲回家看望。这里以前是物理系教授饶毓泰的住室，“文革”开始时，饶教授因为受不了造反派的吊打，就在这间屋里自杀了，此后再无人敢住。现在，就让

我们一家住在这里了。小卡认了门，后来它每天都要来。“文革”爆发后，我家就断了来客。当时，小卡成了最热诚的客人。父亲每天都盼着小卡来。虽然一个月只有23元的生活费，吃不上什么像样的饭菜，但是父亲总要留下一口饭，等着小卡。

然而，无论经历多少挫折，父亲依然是父亲，他内心的刚毅从来也没有改变过。我们曾经问过父亲：“爸爸，‘文革中那么多人自杀，你想过死吗？’”父亲的回答从来都是坚定的：“我从来没想过死，我只是想，我该怎么活下去。我不相信他们搞的这一套是马克思主义的，是毛主席的意思。我想我一定要好好活下去，要看到这场运动的收场，看到这些跳梁小丑的结局。我就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会让这样的‘革命’长久的，中国一定会变。”

◇ 从沉默到有话想说

从某种意义上说，父亲应该是最愿意把“文革”从北大点火的情况讲明的人，然而，事情却恰好相反。对此，父亲一直保持着沉默，一晃就是36年。记得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国各个领域、各条战线都在拨乱反正，母亲和我们三个大些的子女在“四人帮”粉碎前后，每个人带着一段难言的苦痛先后从宁夏、山西、云南、陕西返城。最小的妹妹在我们都下乡到外地以后，从10岁就一个人在北京，过着穿不好、吃不好，近似野孩子的日子。

那些年，伤痕文学热，写老师们“文革”经历的回忆文章也多，写彭德怀、陈毅、贺龙等的回忆文章接连问世。一些记者、作家、文学期刊编辑，对揭示“文革”的起源兴趣颇高，有人就向父亲约稿，但父亲都是低调回绝。父亲自己不写有关文章，也不同意孩子们写。那时，他总是说：“不能写，写了也不能发表，起码20年不能发表。”为了防止孩子们写文章发表，他对孩子也不谈与北大点火有关的人和事。

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家进一步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越发深入人心。人们对渐渐远去的“文革”，看法更加客观辩证，也更加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父亲的精神桎梏也有所缓解，对“文革”起源，他有时会涉及零星问题，或部分片断，但仍限于只谈具体事，不作分析和评判。父亲总是说：“让社会和历史去客观评价吧。”“一个人默默来到人世間，一生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内不愧心就够了。”

然而，1998年，在父亲84岁高龄时，一部在某电视台播出的电视剧违背史实，把父亲说成与康生沆瀣一气，加害马寅初老先生，这对父亲的沉默是一次绝大的打击。因为康生在“文革”前派妻子曹轶欧率调查组到北大，支持哲学系聂元梓等写大字报，将父亲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北大是“三家村”分店，进而引发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这本应是众所周知、无可更改的史实，但是，如今父亲还活着，事实已经黑白颠倒了。此后，又有文章提出，1966年北大哲学系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他们自己发动的，没有人指使”和“康生没有插手这张大字报”的说法。这使父亲一贯坚持的历史应由社会客观评价的观点受到挑战。父亲开始想说话了。

2001年下半年，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海文通过我们这几位子女约父亲谈谈有关“文革”起源的问题。这一次，父亲意外地答应了。李海文是中央党史部门的同志，这在父亲眼里意味着是组织行为。其次，海文的父亲是“文革”前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李琪，在“文革”中被逼自杀了。为了这次谈话，父亲用了两个月时间查笔记，列提纲。关于北大和“文革”，共开列了九个大问题，计划每个大问题同海文谈一个小时。当时，父亲已经是87岁高龄，自84岁经历了某电视剧违背史实的事情后，父亲连连住院，身体明显地一年不如一年。2001年11月11日，父亲终于同海文见面了，并且按照预定计划，用一个小时谈了一个话题，并约好一周后谈第二个大问题，争取一个月谈完九个问题。父亲的身体开

始变得很弱，为了这次谈话，他几乎燃尽了所有热量。两天以后他就住院了，从此再也没有机会去完成拟定的谈话设想。

父亲晚年头脑一直很清晰，大事小事都很难瞒得过他。父亲对党的历次会议、文件，制定的每一个方针、政策都非常关心，而且有自己的看法。但他毕竟高龄，晚年谈北大的历史，通常原则性强，细节谈得少。因为父亲一辈子认真，为了一个细节或一个数字，他会花费一两周时间去查、去核对，这对他来讲是沉重的负担。同海文谈话前，父亲显得紧张、激动，还有一些犹豫。他会问我们这些孩子：涉及一些问题谈不谈？到了这一刻，我们才真正理解了父亲36年的沉默。我们对父亲说：“爸爸，历史的问题应该照实说。现在，大家已经可以客观地看待许多历史问题。”父亲点头，轻声说：“是。”但是，他最终没有谈及他想讲的那些事。

在父亲看来，“文革”从北京大学点火是有社会和历史原因的。北京大学素来有着革命的光荣传统，五四运动以来，在历次思想的、政治的运动中，北大始终保持着这个光荣传统，因此，在全国高校影响很大。“文革”前，运动频频，形成很多高校看北大的局面。

“文革”是以学生、知识分子为主体，首先发动的又是学生、知识分子，在一场以文化、思想为主的“革命”中，倘若没有北大的参与，或者说没有北大打头炮，这场“革命”很难在全国开展。对学生来讲，他们血气方刚，没有更多的斗争经验，很容易被貌似革命的“左”的思想所蒙蔽和蛊惑。

◇ 认为北大“社教”运动是“文革”的前奏

在父亲看来，北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文革”的前奏，也是“文革”的导火索。在北大的“社教”运动中，党的队伍，包括行政上的、知识分子骨干中的党员队伍分裂了，形成了一支可以和“左”的炮打司令部相呼应的队伍。父亲说：“北大校党委原来是很团结的。‘社教’运动中，把北大作试点，把北大搞分裂了，从校党委，一直到系总支和行政系统的各级干部被搞得分裂了。这个问题给北大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北大的“社教”运动，是从中宣部派出调查组进入北大开始的。1964年上半年，“社教”运动主要是在农村展开。1964年7月2日，中宣部调查组进入北大，在一个多月后的8月29日和四个月后的11月29日，调查组连续向中央写了《一号报告》和《二号报告》。《一号报告》中说，“在北京大学，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进攻是很猖獗的，特别集中地表现在教学和科学研究领域之中。校内帝国主义、蒋介石、修正主义的特务间谍活动，贪污盗窃分子、流氓分子的活动也相当严重。北大党委对这些问题却没有认真抓”。

“北大党员干部队伍政治上严重不纯”。还援引聂元梓的反映说，“北大党委对中央的方针没有认真贯彻执行，提拔和重用一大批政治上不纯的干部”。《二号报告》则定性北大党委领导“走的是资产阶级的道路方向”。《一号报告》送上去之后，康生作了多处批示，说坏人“混入北大党的机构内，要严重注意并进行审查”。此后，在10月中旬，中宣部决定在北大进行“社教”试点。调查组拟定了《关于在北京大学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初步计划》，提出从全国宣传、文教部门及全国高校抽调100多人，在北大抽调优秀党员骨干30人，组成北大“社教工作队”，11月正式开始“社教”运动。

调查组一进校就从调查队伍入手。父亲讲，从“社教”运动开始，北大的校党委、系总支、行政领导班子便开始分裂，党内无论做什么决议，内部都无法统一。这种分裂不是必然的，而是人为的。调查组来头很大，开始叫“中央调查组”，后来才改为“中宣部调查组”。调查组不按组织系统开展工作，基本上是甩开校党委，自成系统，单搞一套。父亲与调查组负责人很熟悉，在华北局工作时，父亲是华北局前委书记，该负责人是华北局宣传部

副部长，每天在一个饭桌上吃饭。该负责人带队到北大，没有与校党委打招呼，父亲去看他，问：“是不是汇报一下北大的工作？”该负责人说：“不要。”父亲又说：“需要北大做些什么？”该负责人说：“也不需要做些什么。我刚从郑州出差回来，听说北大的会议多，上边叫我来看看为什么会议多，就这些。”该负责人的回答让人摸不着头脑。但是父亲明白，单是为了北大会议多，来一个人看看就够了，何至于带了一个最初10个人，后来增至30多个人的调查组来呢。几天后，父亲到北京市委，向刘仁汇报了该负责人和“中央调查组”到北大的情况。刘仁回答说：“他来，我们不知道，他来干什么，我们也不知道。”这就更加令父亲感到疑虑和奇怪：北大是双管单位，党的工作、干部工作、政治运动、政治思想工作接受市委领导，教学等业务工作接受高教部领导，是高教部直属学校。现在，中宣部派来调查组，市委都不知道，意味着什么？刘仁问：“他在人大的情况你听说了吧？”父亲清楚，这是指该负责人在去北大之前曾带队到人民大学“调查”，搞了两个月，交了一份报告，人大为此被搞得队伍分裂，人心惶惶。刘仁对父亲说：“你可千万不要胡说八道。凶多吉少啊！”

北大的“社教”运动，围绕着“搞清学校各级组织领导权究竟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还是资产阶级手里，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的五项任务”而展开。工作队把北大党委完全撇在一边，并且很快在全校20个系、党总支开始面对面的斗争，把北大党委和各级党组织放在对立位置。在这样的来头和形势下，北大党委、校务委员会、系总支、监委会等开始分裂，思想政治上出现混乱。有人背着党委向工作组提供干部档案材料等。哲学系以聂元梓为代表的一批造反力量逐渐形成。聂元梓原是哈尔滨市委理论处干部，父亲到北大后，调了若干有革命经历的干部充实校系领导，原本不认识她。聂元梓经人大党委书记推荐，又经北大组织部同志调查来到北大。哈尔滨市委在介绍信中，同意聂元梓调出，但是却说这个人只能做系级干部，不能再往上提，当时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到北大以后，聂元梓的毛病充分暴露，她看不起地下党干部，也看不起一般干部，而且散布流言，拨弄是非。调查组进校后，她提供了一大批校系级干部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的复杂情况和部分干部本人经历和现时表现中的某些问题，影响调查组，作出“北大党员领导干部政治上不纯的问题很严重”的结论。父亲说：“该负责人直接在哲学系召集会议，叫我去听意见。什么听意见，就是批斗。在那个会上，该负责人几次追问：‘你和彭真、北京市委什么关系？’”36年之后，父亲说：“现在回想起来，打着中央调查组的旗号，跟市委不打招呼，到北大这样一套搞法，已经暴露出来他们早就想搞事，一切就好像有预谋。”

北大的分裂，根本上是对高校、高校干部队伍基本状况的分析存在分歧。对北大干部队伍的分析透视着对国内基本矛盾、阶级斗争基本态势的不同认识。父亲是反右斗争后期从铁道部调到北大的。父亲说：“我是1957年10月17日到北大工作的。当时，中央准备抽调一大批省部级干部到高校担任领导工作，为的是加强高校党的领导。这与当时中央对高等院校形势估计过分严重有关。这个估计可以说基本不正确。”

◇ 去北大工作不是父亲个人的意愿

父亲的悲剧命运，也许正是从如何看待和对待高校知识分子和干部队伍开始的。父亲到北大工作，正是1957年反右斗争基本结束，党中央对国内基本矛盾作出过于严重的估计，造成反右斗争扩大化错误的时刻。调父亲到北大工作，他个人毫无思想准备。

父亲说：我是1949年6月调到铁道部的。那时，毛主席号召党的干部除了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每个人要学点技术，还要学好业务。20世纪50年代初，铁路系统苏联专家很多，我下决心学习铁路运输，干一辈子铁路。那时，专家讲课我从不漏课，当时的听课笔记到现在我还保留着。1957年，高校干部调动名单上有我，铁道部的滕代远、吕正操都向

上级反映，希望不调我走。后来，我又直接找到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安部长说，你别提了，提也没有用，这是中央的决定，你去吧，将来有机会再调出来。

父亲讲的是实话，他的确十分热爱铁路工作。父亲1949年去铁道团工委工作时只有35岁。两年后，他被调到哈尔滨铁路局（中长铁路范围）任局长兼党委书记。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又正值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他不停地奔波往返于满洲里—沈阳—丹东之间，忙于军事物资和其他各项物资的调运。仗着年轻，父亲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的觉。中长铁路范围广，但只是单轨铁路，为了保障运输，特别是完成军事运输任务，父亲潜心学习现代管理知识，研究运输技术和业务，总结科学运营和管理的规律。他和哈尔滨铁路局干部职工一道总结概括出来的“中长路经验”，全面改革了中国铁路的传统管理办法，大大提高了铁路运力，被铁道部推广到全国路局，为新中国铁路运输事业的管理水平、运输能力以及经济效益的起步打下了基础。那段时间，他每天都要和弟弟刘居英（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运输指挥部司令员）通电话，隔着鸭绿江，哪怕隔着再多的城市，他也能从电话里听到战场上震耳欲聋的炮声和弟弟刘居英询问军事物资调运情况的焦急嘶哑的声音。兄弟俩的命运被抗美援朝战争再次连在了一起。父亲原名刘志贤，比刘居英大两岁四个月，两人手足情深，难以言表。当年，他们一道参加革命，20世纪30年代一道在北平，父亲以英文100分、刘居英以数学100分的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后来又一道参加了“一二·九”运动，之后分赴抗日根据地。在革命的关键时刻，他们一直生死相援。1933年，日本人要抓父亲，是叔叔帮助烧掉党的重要文件，协助父亲转道北平。父亲和叔叔前后脚担任哈尔滨铁路局局长，父亲接手局长后叔叔便到了朝鲜，在彭德怀司令员手下，任志愿军铁道运输指挥部司令员。那时，兄弟俩为了新中国、为了抗美援朝战争，再次以生命、智慧，以艰辛忘我的工作相互支援，并且最终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为新中国政权的巩固和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这是父亲一生中最值得怀念和最引以为豪的一段时光。“文革”结束父亲重新工作后，一直希望重回铁道部，这个愿望没有实现，是他人生中不大不小的遗憾。他总是说：“我这一生，工作最顺心、最有成效的时期是在铁道部工作的那些年。铁道部班子团结，产业队伍好带，运输是一门专门的业务。”

父亲去北大不是他个人的意愿，但是，组织上选中他去北大也不是没有缘由。父亲了解学校，懂得知识分子。1933年，父亲在吉林大学预科班学习，到北平后，他考上了北大教育系，并研修英国语言文学，同时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5年，父亲和一批进步学生一起，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当时，父亲还是《世界日报》的记者，使用“卢荻”等多个笔名采访过斯诺、胡适等。父亲曾经说过，若不是革命的浪潮，说不准他会选择教师的职业。但是，抗日救国改变了他的人生选择。新中国成立后，他完全被铁路这个现代工业所吸引。在团中央工作时，他找到安子文、吕正操，跨入铁路系统，担任了铁路团工委书记。1957年调他去北大，他的确感到突然，因为教育工作于他已经很陌生了。父亲说：“去北大之前，我对解放后的高等学校什么样，脑子里不清楚。我对学校还是老观念，认为学校是个学习的地方，是个安静的地方。我原来的英文丢得差不多了，去北大前，我把英文短篇小说、英文词典，还有一些英文论文搜集起来，准备到北大随班听听课，恢复一下英文，也学点本事。结果，去了以后一个字也没用上，运动一个接一个。”可以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父亲同知识分子的天然联系，从优势转化为悲剧性的劣势。

◇ 围绕北大“社教”运动等问题发生分歧

父亲说：“我到北大首先面临的是队伍和干部问题。我在1957年10月18日开始工作，因为什么情况也不了解，先听取汇报。根据北大原党委书记10月19日在校务委员会上的汇报：截至当时，已划教职员右派90人，学生右派421人，总计511人。从本

周起反右斗争转入整改阶段。当时，对于反右派斗争有什么错误，我还来不及去清醒地认识，我的思想只是从工作上考虑：右派分子如此之多会给工作带来许多困难。如，物理系、数力系（数学力学系），有的班级右派分子占据多数，校、系还怎么能办下去？再有，学校里有了这样一大批消极力量，这个负担是很沉重的，对他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将要花费很大的力量去做，能完得成吗？”“北大的领导干部队伍怎么样，这是我到北大工作首先要了解清楚的问题。当时，北大共有15个学系，系主任15人，除个别人外，都是拥护党和社会主义的、学术造诣深的人士所担任，党员占1/3。校务委员会共57人，其中党员10人，按照当时以政治思想划分知识分子为左、中、右三类的标准分析，左派不少，中占的数量比较大，属于右类的只有4人，其中最典型的是傅鹰，是不戴帽的右派。校务委员会是在党委的领导下工作，大事都由校党委研究决定。北大的教学行政领导干部基本上都是党员，系总支更不要说了，都是地下党的优秀党员干部。这些人对学校的情况非常熟悉，而且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锻炼，跟国民党反动派、帝国主义进行过激烈斗争，是一些经过考验的优秀干部。虽然说缺乏一定的社会实践，这也不能怪他们，解放前他们在旧大学，怎么去结合劳动人民？分析的结果可以说明，北大的领导权仍然在我们党的手中，不存在被资产阶级篡夺的问题。”基于这样的基本认识，父亲认为，北大的干部队伍若再调些参加过军队和根据地斗争的干部，让他们与学校的地下党干部结合起来就更好了。

对北大干部队伍估计，折射着如何认识国内基本矛盾的问题。这对于一心想做好北大工作的父亲来讲，是难以去认识和把握的。而父亲对北大干部队伍的基本分析又恰恰与当时中央部分代表性人物相左。调查组向中央递交了《一号报告》《二号报告》，将北大说成走资本主义道路方向，干部队伍有严重的政治问题。调查组负责人召开全体工作队成员和积极分子紧急会议，只字不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讲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不讲团结—批评—团结，却要在北大打一场“淮海战役”，他在讲话的第一部分一连用了40个“斗争”字眼。学校的面对面斗争愈演愈烈，各级党组织都要分化和组织出一批积极分子队伍，去揭发批判另一批领导人。

自此，北大的“社教”运动闹大了，各方面的反映汇聚中央。围绕如何看待北大的干部队伍和办学方向、如何看待北大的“社教”运动发生分歧。此前，调查组的《一号报告》《二号报告》从中宣部转到北京市委，北京市委的批复意见是明确的，指出“大专学校的高级知识分子，包括一些党政领导干部的家庭成分和社会关系及个人经历是复杂的，参加革命以后的表现也是各不相同的。其中，肯定有些坏人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有些虽然是革命的，但又同资产阶级和反动家庭的思想政治界限划不清楚，或者不能完全划清”，建议成立领导小组，“把北大全部领导干部系统地研究一次”，“主要任务是弄清北大干部的政治面貌”。

1964年10月21日，中宣部向中央书记处提议，在北大开展“社教”试点。据有的同志回忆，次日，彭真找我父亲、北大党委副书记张学书、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和大学部干部兼北大党委副书记彭珮云等谈北大工作，指示父亲选几个系蹲点，写个报告，讲清北大的形势和任务，说“不要空讲路线如何，现在不做这个结论”。

11月5日，“社教”运动在北大正式开始。刚一周，矛头就对准校党委，公开点父亲和彭珮云的名，并追根北京市委。校党委书记、副书记7人中有5人被批斗，党委委员14人中有8人被批斗。党委实际被夺了权，校内、校外盛传“陆平是坏人”“北大烂掉了”。各高校的干部十分震惊，紧张地关注着北大的命运。

1965年1月，中央针对全国“社教”运动中的偏差，下发了毛泽东起草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通称“二十三条”）。3月3日，邓小平主

持中央书记处会议，着重讨论了北大的“社教”运动。书记处对北大“社教”运动的基本估计是：北大是比较好的学校；陆平是好同志，犯了某些错误，不存在改换领导问题。关于这句话很多人都知道，所说的错误，并无确指。

但父亲讲过，他的“大炮”性格也引祸上身。1959年，北京市委传达庐山会议精神，会上，将彭德怀的“万言书”发给大家，让大家发表意见。父亲刚从外地出差回来，不了解内情。父亲的发言是：这封信写得挺好，反映了现时的情况，没有什么错误。有个别话说得不好，比如说什么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等。这些话当时即被整理成简报。1966年，中央催北京市委开市委全会，拿出一堆彭真的材料，让大家表态。开了几天会，父亲和许多同志一言未发。此后，在批判“三家村”的会议上，父亲在小组会上发了言，说“‘燕山夜话’和‘三家村’的专栏文章我都看过，没感觉到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三面红旗的有关政治问题”。父亲的这些言论通通被记录在案，成为“文革”中的罪证材料。

中央书记处会议以后，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给北大社教工作队队员和北大党委常委作报告，重点讲解了中央在1965年1月14日下发的“二十三条”，并代表中央社教5人领导小组，宣布把北大的社教5人领导小组扩大为8人，增加校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戈华、彭珮云。几天后，北京市委在国际饭店召开北大党员干部会，学习贯彻“二十三条”。市委书记处书记万里到会，传达中央书记处会议精神，要求大家总结工作，统一认识。4月初，中宣部又在民族饭店召开北大工作队骨干座谈会，进一步学习贯彻“二十三条”和中央书记处会议精神。会上，陆定一代表中央5人领导小组宣布：许立群接任北大工作队队长职务，8人领导小组改为9人领导小组，增加常溪萍为领导小组成员。

6月29日，彭真给北大社教工作队和北大党员干部作报告，态度十分明朗地说：应当肯定北大是共产党领导的学校，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如果全国都按北大前一段的搞法搞，怎么办？如果北大是资本主义熔炉，全国还有几个社会主义熔炉？北大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学校，全国还有多少无产阶级统治的学校？学校工作中有缺点错误，应该认真检查改正，但不应该否定一切。他还提出，必须在北大党员干部中进行一次整风教育，通过和风细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实现新的团结，否则，北大今后将无法正常工作。

7月29日，中宣部、高教部和北京市委联合通知，北大党员干部在国际饭店召开整风学习会议，校系两级主要干部及部分支部干部和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参加。北大社教9人领导小组和3个领导部门的负责同志共14人组成领导小组，许立群任组长，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为副组长。参加会议的有250多人。按照会议宗旨，大家自觉革命，弄清思想，团结同志。父亲在小组会上还带头发言。绝大多数总支很快统一了认识，一个月里陆续返校。只有哲学系小组分歧意见多。又经过三四个月的学习、工作，聂元梓、孙蓬一、杨克明等几个人勉强发言，但内心耿耿于怀，等待时机，予以反攻。

◇ “文革”之火为何从北大点燃

北大的思想政治混乱暂时平缓下来，几乎停顿的教学工作继续展开。父亲到北大以后，很重视教学工作。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研摸底，在1958年，父亲提出北大的教学改革设想，提出要把北大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包括：有巩固的党的领导，科学水平是最先进的，学校内部的结构应是教学、科研、生产的联合基地。按照这样的设想，父亲主持全面修订教学计划，进一步推进北大从以文科为主发展向文理并重综合大学发展的教学改革，陆续增设了生物、生物物理、世界经济、计算技术、声学、西班牙语等10多个专业学科。父亲四处寻找理科教

学用地，但都不是很理想。刘仁得知情况后，亲自出马，帮助选择了昌平十三陵作理科基地，计划建成50万平方米的理科分校。周恩来将这个基地列为全国重点工程。学校当年开办了半导体、电真空等20多个车间。

为了适应教学改革，在1959年的教学会议上，父亲又提出政治运动过多，应该从政治运动转向以教学为主。学校开始实施教师培养计划，父亲主张“不要再用‘白专’的概念”，“而要提又红又专，德智体全面发展，要做既有文化又有科学知识的劳动者”。为了调动积极性，在北京市委的同意下，为32个“右派”摘帽。全校教职员的心都在往搞好教学，提高教学和师资水平上凝聚。学校制定了《关于北京大学发展规模和五年基本建设计划的报告》。1960年，学校的教学、科研的发展情况进一步好转。3月，北大成立了研究院，用以培养研究生，计划8年内学生达到1.8万人，研究生达到2200人，教师达到3012人，25项重点科研项目人员达到200人。接着，学校一次提拔了100多名知识分子干部充实到校、系、科研、生产、行政管理的领导岗位，知识分子在1957年反右、1959年反“右倾”中形成的负面消极心理有所消散，积极性有所高涨。

1961年以后，面对三年自然灾害，设施建设的发展速度虽然减缓，但教学、科研发展的好事不断。到1963年，重新修订教学计划后，北大达到48个专业；数力系1300人迁进十三陵理科新校址；继《北大1960—1962年自然科学研究发展纲要》之后，《北大1963—1972年自然科学研究发展纲要》出台，准备加强与发展20项重点科研项目和重点学科，建立17个研究机构，补充专职人员700人。转过年来，文科的主要任务也确定下来，是“加强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技能训练”。重新研究和确定若干专业的发展方向和培养目标，调整课程设置。半导体、胰岛素等重点科研项目也相继上马。如果没有政治运动，没有1964年调查组、“社教”运动的干扰，北大的建设要快得多。

北大局势的平缓是十分短暂的。因为“文革”的发动是自上而下的，为了发动这场“革命”，“社教”试点在北京一共有10个点。虽然试点中类似北大“社教”的错误后来由彭真派万里逐一推翻，但认识的分歧没有中止。到1966年四五月间，在中科院和北京市委机关出现了大字报。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理论领导小组组长的康生，认为时机已到，组织了一个调查组，由他的妻子曹轶欧任组长再次进驻北大，任务很明确，就是“从搞北大开始”，“往上揭”，“揭发陆平、宋硕、市委”。调查组5月到北大，父亲去见曹轶欧，曹说，就是来看看，了解一下北大学术批判的情况。父亲提出北大党委向调查组作一个汇报，曹说，不用了。父亲为调查组在校内安排了住处，但是曹没有住，而是住在西颐宾馆。北大哲学系教师、后到马列主义研究院的调查组成员张恩慈，联络一批北大党员、干部，主要是“社教”积极分子、“左派”到宾馆，由曹轶欧同他们谈话，聂元梓等撰写大字报的几个人均在其列。据“文革”后聂元梓、杨克明、张恩慈等人的交代，当时曹谈话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从北大往上揭”，明确说“可以写大字报”。聂元梓在交代中就说：“大字报并不是我们自己要搞的，是曹轶欧叫我们搞的。”1966年5月25日，在康生幕后指挥、曹轶欧直接出面下，由聂元梓等7人起草的、臭名昭著的《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什么？》大字报出笼了。大字报贴出的当晚，校内反响强烈，绝大多数教员、学生反对大字报的观点。华北局来人了解情况，并与聂元梓谈话，当时聂元梓底气很足地说的就是这句话——“大字报并不是我们自己搞的，是曹轶欧叫我们搞的。”

至此，经过几年的酝酿、较量，最终在康生等人阴谋支持下具有了一定思想、队伍基础，“文革”之火就从北大点燃了。6月1日，《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同时全文刊登、播发了这张大字报，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宣布撤销父亲和宋硕、彭珮云党内外一切职务。紧接着，6月3日，上述媒体又向全国发布，解散北京市委，撤销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彭真的党内外一切职务。8月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贴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

一张大字报》。在这股前所未有的飓风般的支持下，思想文化领域的这场斗争变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燎原之火熊熊燃向全国。

36年后，有人问父亲：为什么当时中科院、北京市委机关等都有大字报，却单单拿北大的这张大字报公之于众？父亲回答：“除了上述原因，一是它点了北大党委、北京市委的名，一是它定性北大、北京市委走资本主义道路方向，再一个，北大有聂元梓一帮子人做内应。如果说还有什么原因，是不是我1938年离开延安，受命到西安办事处与李昌一道筹备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并筹备召开第一次全国青年代表大会，直接归少奇同志领导；在晋察冀军区时，归刘澜涛直接领导，因为他住在外村，很多事找彭真同志，到北大后，更是受彭真同志领导，从我这点火，可能燃得更快点儿？”很明显，父亲是因被视为“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一员而遭此横祸了。

36年过去了，父亲走了。作为子女，写下这一篇文章，以示对父亲的怀念。愿父亲一路走好……

□ 来源：《党史博览》2020年第2期（原文：陆莹：《父亲陆平三十六年的沉默》，《纵横》2003，第3期）

~~~~~

#### 【史海钩沉】

陆平、彭珮云是怎么“解放”的？

• 钱 江 •

1966年6月2日的《人民日报》转载了聂元梓等7人于5月25日在北京大学贴出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标题是《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什么》，将他们直指为“黑帮”进行批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则于6月1日晚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中全文播出，一时轰动全国。这张大字报是得到领袖钦点的，被视为“文革”楷模，被点名的宋硕、陆平、彭珮云受到残酷迫害。

◇ “第一张大字报”点名的三人均遭迫害

这张大字报标题排名有些蹊跷，将中共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列名第一，实际上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1914—2002）的职务更高。副书记彭珮云虽然年轻，党内资历却不在宋硕之下。大字报作者项庄舞剑，剑指以彭真为第一书记的北京市委，因此就作了这番手脚。

在残酷的“文革”中，宋硕（1923—1969）第一个倒下了。他原名钱宗澜，1945年在北京大学化工系读书时加入中共，经历北平地下斗争。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担任北京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副部长。被“第一张大字报”点名批判后，宋硕遭受关押，多次在上万人以上规模的大会上弯腰挂牌、遭受批斗，五个子女或下放农村、或流浪街头。他在监禁中患上肺癌，1969年10月30日含冤去世，年仅46岁。

宋硕去世后，陆平成了被“大字报”批判的“领衔人物”。

“文革”前三年中，中国著名高等学府北大、清华被起来“造反”的代表人物聂元梓、蒯大富等控制，私设公堂，监禁和殴打两校的干部、教授。陆平首当其冲，被长期监禁，审

讯得没完没了，受到多次吊打。彭珮云是女性，被失去理智的“红卫兵”殴打最严重的一次，也是卧床不起，多日才缓解，同样被长期监禁。

1968年7月28日，领袖无法容忍北大、清华的混乱状态，命令工人宣传队在军队支持下进驻两校，结束了那里由年轻“造反派”一手遮天的情况。此后，陆平、彭珮云被解除单独监禁，关进集体大“牛棚”，和诸多“黑帮分子”一起劳动改造。

进驻北大的工人和军队“宣传队”职掌领导权，来自部队的某军政治部副主任刘信任总指挥，副总指挥有荣长风、局成俊、魏秀如（女）、华广信、焦克琛、李景斌（除荣长风是北京第一机床厂军代表外，余五人均为工人）。

这个指挥部进驻北大后，一方面制止了大规模学生武斗，一方面奉行“文革”的错误指导方针，进行残酷的“清理阶级队伍”，造成大量冤案，以致命案频发。这说明这些指挥者不能胜任管理北京大学的使命。

1969年3月24日上午，81名来自“8341部队”的军宣队员由政委杨德中、副政委王连龙率领进驻北大，组成新的领导班子，其中包括了迟群和谢静宜。

9月27日，北大“革委会”成立，杨德中任主任，王连龙为排名第一的副主任。在此之前，从1月开始，身处“监督改造”中的陆平和彭珮云的情况有所改善，每月暂发生活费40元，未成年子女可从工资中支取15元。

北大革委会成立后一个月，陆平、彭珮云被遣送江西南昌郊区鄱阳湖畔刚刚兴建起来的北大鲤鱼洲“五七干校”，不再单独监禁，随干校学员进行繁重的体力劳动。在那里，陆平的健康被摧残了，一度病危。彭珮云比较年轻，健康也大受损害。使人感到意味深长的是，领衔“第一张大字报”的聂元梓已经失势，也被遣送到鲤鱼洲劳动。

鄱阳湖畔鲤鱼洲是血吸虫病高发区，数百名北大、清华的教师因此患病。为免于这支队伍全军覆没，该干校于1971年9月撤销，陆平、彭珮云回到北京。

陆平的身体已难以支撑，只能在家养病，健康逐渐恢复。彭珮云被送入北大新设的大兴县“天堂河”干校继续劳动。此时，对他们的“监管”明显松弛了。

陆平、彭珮云在革命队伍中成长，历史清楚，“造反派”找不出毛病。

#### ◇ 饱受煎熬中的漫长等待

这时，北大校内秩序逐步恢复。1971年5月，北大成立党委，杨德中任书记，王连龙、刘信、田双喜、张学书为副书记。到9月，杨德中调回部队，王连龙主持北大工作，并于1972年2月成为北大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

从1973年起，北大“解放”老干部的工作逐渐开始。先是校党委于1月批准，将“文革”开始后定为“叛徒”的副校长黄一然“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仍开除党籍（“文革”后黄一然被彻底平反），又宣布“解放”原校党委副书记戈华。同时还宣布，将聂元梓戴上“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进行“群众监督”。

这样一来，陆平、彭珮云一案将趋于“解放”就露出了势头。

这年3月，彭珮云的丈夫王汉斌被确定为“人民内部矛盾”，从山西潞安县放逐地回到北京。由此，彭珮云被允许每两周可在周末从干校回家一天。

这时，王汉斌和彭珮云在北京已经没有了家。他们两人来到彭珮云的妹妹彭静云家中见面，看望上中学的小女儿王薇。这是夫妻两人自“文革”爆发六年后的第一次见面团聚，相见时既兴奋又伤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他们欣慰的是，王薇长成大姑娘了，学习努力，品行优异。不久后，王汉斌分到北京和平里的一套两居室房子，这对夫妇才重新有了在北京的家（2011年12月30日在北京采访彭珮云的记录）。

北大的老干部、老教授一个接一个“解放”，恢复了工作和教学，陆平和彭珮云还在艰难等待。他们两人遭受如此磨难，由聂元梓担纲的大字报当然厥功至伟，关键之处在于领袖毛泽东支持了这张“大字报”。聂元梓倒台后，能不能解放陆平和彭珮云？执掌北大事务者总在犹豫。

#### ◇ 曲折迂回，终于得到可以解放的准信

1974年国庆节前夕，原教育部长蒋南翔在周恩来过问下获得“解放”，于9月30日参加了人民大会堂国庆25周年招待会。蒋南翔重返政治生活，直接推动了陆平、彭珮云一案的解决。

1974年11月15日，北大校党委常委会议，审议了陆平、彭珮云的材料，将他们定性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在当时被看作是“人民内部矛盾”，是走错了路的问题，决定予以“解放”，恢复党组织生活。

但是，会议的主持者还多一个心眼，先一步解放被“第一张大字报”最后点名的彭珮云。北大校党委在11月16日向北京市委报送《关于解放彭珮云和恢复其党组织关系的请示报告》，很快得到批准。彭珮云被“解放”了，使陆平和家人看到了希望。

陆平是当年的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社会影响更大。时任北大党委书记王连龙倾向于解放陆平，但觉得要解放陆平，没有领袖指示不行。他即刻灵机一动，想到北大历史系有两个由中央办公厅送来的女学生，假日里经常回到中南海去，她们有机会见到毛泽东。原本来自中南海警卫部队的王连龙马上找来她们两人吩咐，如果你们有机会见到主席，要相机请示如何解决陆平的问题。

那两个女学生果然很快就做到了。她们从中南海回来，向王连龙汇报说，见到主席了，转达了北大的请示，主席答复说：“可按蒋南翔的办法处理，放了算了。”

有了来自领袖的指示，北大负责人要解放陆平就算心里有底了。校党委于11月25日向北京市委提出解放陆平、恢复他党组织生活的报告，报告直接引用了从领袖那里传来的原话：“可按蒋南翔的办法处理，放了算了。”

既然天降纶音，其后顺理成章，九年前被“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打倒的陆平历经折磨，于1975年4月获得“解放”——解除“群众专政”，恢复组织生活。

此时，仍在北大执掌大权的迟群和谢静宜威风不减，他们将彭珮云召来办公室谈话，对她说：你还年轻，要好好改造。因为你还是有错误的，更要好好改造。

谈话气氛很不融洽，迟群、谢静宜的话使彭珮云很反感，彭保持沉默。迟群、谢静宜接着宣布，分配彭珮云到北大政治部政工组，做一般事务工作，主要做文书收发。

陆平具有更长的革命资历，又是北大前任书记，北大已经不好安排他了。当年7月，陆平就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后为航天工业部）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

“文革”终结后，彭珮云担任了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

2014年7月10日于北京

□ 来源：《世纪》2014年06期

~~~~~  
【动乱年代】

南开大学文革往事

• 魏宏运 •

记得文化大革命刚结束，学界有人性善性恶之争。孟子讲：人性无有不善，人生下来就有同情、怜悯、羞恶之心，这就是仁义礼智四种天赋道德的萌芽。《三字经》头一句也说：“人之初，性本善。”但从文革中暴露的事实看，人性是恶，如荀子所说的：人生来就有各种欲望，所以人性本恶，而善是后天学来的。也许文革是一特殊现象，在那时，南开园中，只看到暴行肆虐，是恶而不是善，革命派疯狂得很，无法无天，使南开园成为暴民社会，可以举出种种例证，来说明这一问题。

◇ 虚构的何姿黑帮和百丑图

文革一开始，校党委书记臧伯平为保护自己，就授意宣传部副部长邢馥德，虚拟了一个黑名单，以副校长何锡麟、姿平为首，把全校百多名教师和干部都打成牛鬼蛇神，这些人被称为“何姿黑帮”。许多教授是以反动学术权威为名成为黑帮的，一些党政干部在过去向领导提过这样那样的问题，在他们看来是不顺从的异己分子，就被列入，于校东门内马路旁搭起席棚，将百余人丑化，写上罪名，以漫画形式示众。譬如：

吴大任	数学系教授、教务长
滕维藻	经济系教授、副教务长
李何林	中文系系主任、鲁迅研究专家
华粹深	中文系戏曲专家
姚 跃	中文系党总支书记
朱维之	中文系教授
王达津	中文系教授
邢公畹	中文系教授、语言学专家
许政扬	中文系讲师研究古典小说
郑天挺	副校长、明清史专家
杨翼骧	中国史学史专家
魏宏运	从事中国现代史教学
巩绍英	从事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

曾鼎和	数学系教授
严志达	数学系教授
胡国定	数学系副教授
杨宗盘	数学系教授
刘晋年	数学系老教师
姜安才	物理系系主任
何国柱	物理系教授
张云祥	物理系党总支书记
何炳林	化学系教授
陈茹玉	化学系教授
王祖陶	化学系青年教师
陈天池	化学系教授
王积涛	化学系教授
陈荣梯	化学系教授
李国冀	校团委副书记
杨敬年	经济系教授
龙 吟	经济系教授
钱 荣	经济系教授
谷书堂	经济系讲师
何启林	经研所教授
鲍觉民	地质地理教授
王赣愚	政治学专家
赵景员	物理系副教授等等

这些人都给画成奇形怪状，有的被画成脑袋、脖子、鼻子不成比例，有的头大身子小，有的长腿，有的短腿，有的面目狰狞等等，张贴在校内马路旁的席棚上示众。画家是有功夫的，也有想象力。

红卫兵据此，根据1966年6月1日，陈伯达授意审定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扫“四旧”的社论，对“黑帮”随意抄家，抢走各种财物。学校电台不断点名要“黑帮”分子到指定地点交代问题。如勒令老教授刘晋年交代历史问题，勒令我交代地下党情形。不去就要砸烂狗头。红色恐怖笼罩了校园，扣发工资，戴高帽子游行，剃阴阳头，挂着“黑帮”牌子扫地，或住进牛棚等，集各种暴行之大成，其残酷是难以笔墨形容的。举例如下：

◇ 花样翻新的暴行

一、抄家

抄家是以“扫四旧”的名义进行的，实际上是一轮抢劫运动，受害者的东西，被任意抢走，新的旧的，只要他喜欢，就成为他的囊中物。举例来说，郑天挺副校长的旧衣箱及杂物箱约6—7箱被拉走，内中有郑老父亲清朝衣物等。是年冬，曾展览，展出的东西已遗失，书箱拉走了3—4箱，遗失了一些。字画、砚台、石头、墨均全部拉走，后退还一些，损失惨重。其中信件最重要的有胡适去南京后给郑老的信，以及傅斯年的信及照片，全部遗失。

吴廷璆教授被诬为大叛徒、大汉奸、大卖国贼，大标语贴在其邻居许政扬的外墙上。他早年从日本毕业回国时，带回的青铜菩萨（高约30厘米，带座）、花瓶各一，黑底相册（留学生活为主）一大本，教研所用各种中外书籍（日文居多），以两辆手推车满载拉走，

零星装走者无法统计。著名字画十余轴幅（有罗振玉、于右任、马叙伦、马一浮等手迹）。其夫人李云峰祖传首饰盒一只，内皆银制龙凤、玉器翡翠、珍珠等，为防当年通胀，所购金戒指，以及各种中英文书（多为国学、古典文学、昆曲曲谱等），大相册一本，唱片数十张、集邮册两大本，工艺品盒一只，新购永久牌自行车一辆。以上所掠走之物，大多无归，仅自行车以旧车追回，戒指折还600余元。

我家，被敲掉瓷砖地板，说是藏有枪支，什么也没有挖到，遂恶言训斥。掠去亲戚王迈从罗马尼亚讲学归国时所带的照相机、望远镜。掠去新购买的羊绒皮衣一件，书籍小册子约千余种，内有《西行漫记》、《续西行漫记》（复社版精装）、蒋介石冯玉祥来往信函等、《西安围城十周年记》、《侍卫官杂记》、《孙中山全集》几种版本，这些东西除《孙中山全集》打上××归还外，其他均变换了主人。

杜泽先，校医室大夫，原张学良的私人医生，被抄的有金条等宝物，在旧图书馆抄家物资厅展出。人们都是第一次看到金条，后来这些财富都成为有的工人及其家属的心爱之物了。

二、绑架

滕维藻：副教务长，经济学家。1980年升为校长（有一段时间兼党委书记）。译著有哈耶克的《物价与生产》、《通向奴役的道路》、伊利摩尔豪斯的《土地经济学》。主持编写了我国第一部《跨国公司剖析》，领导撰写《澳大利亚经济》等。1983年受聘为联合国顾问。文革一开始就遭到绑架，被蒙面押到校外一座楼上，看到屋外墙上写有“打倒乔国荃”的标语，始知被押到天津医学院，拘禁20多天，完全与世隔绝。

李何林：中文系教授、系主任，曾参加过1927年的“八一起义”。是研究鲁迅的专家。著有《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鲁迅的生平及杂文》等。文革结束时，调到北京鲁迅博物馆任馆长。文革一开始就受到种种磨难。被绑架到天津医学院，有一天，忘记给他吃饭，到了晚上扔进两个窝头，才充饥。在后来劳改中，每天挂着“黑帮”牌子，我们相见，只能苦笑。

三、熬鹰

苏驼，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哲学系讲师、总支书记、副系主任。80年代为哲学系、社会学系主任，曾撰写《重视研究毛泽东同志关于调查研究的理论与实践》、《费孝通社会调查思想初探》、《田野工作与文化自觉》等，主编和参加《社会调查基础知识》、《社会调查研究原理及方法》、《中国城乡居民社会方式理论研究》等。文革中，红卫兵无中生有，诬其于1946年—1947年在南开中学参加的社团为特务组织，该社团一部分人研究地理，一部分人研究历史，苏是研究台湾地理的，遭四五个人连续围攻，不得休息，让他交代历史问题。

王祖陶，化学系中年教师。文革前，美籍华人司徒月兰要到美国定居，开了个一次茶话会，被诬为潜伏会议。司徒月兰是教英国文学史的，新中国成立前后任外文系系主任，长期任教南开，颇受同学敬爱，要分别时，话别是很自然的。王被邀请参加成为一条罪状，被视为“特嫌”，遭隔离、毒打，并以不交待（并非参加司徒月兰茶话会的人），就送入监狱。王几天几夜被围攻，还以强烈的灯光照射。王恐惧，就讲出了解放前的几十个人。这些人并未参加司徒的茶话会，都受到迫害，有的被打致死。这是一桩典型的逼供信事件。

四、下跪

李霁野，外文系系主任、诗人、翻译家，鲁迅研究专家，是未名社成员，译著有《我的家庭》、《简爱》、《鲁拜集》，著有《鲁迅精神》、《难忘的1919》、《未名小集》、《唐宋启蒙》和《十八卷文集》等。文革中备受摧残，抄家、劳改、游街，还在主楼二楼中厅洋灰地上跪了一夜，家已成不了家，只好暂时和妻子分手。

李宜燮，外文系教授、副系主任、翻译家，主要译著有《箕苾》（济慈书信选）、沈从文的《萧萧》（汉译英）、《如胶似漆》、明冯梦龙著《醒世恒言》选译等。除劳改外，还在主楼洋灰地上跪了一夜。

五、打幡

历史系受害者每天劳改时排队，形成梯队，由魏宏运领头打着幡（意为地主资产阶级孝子贤孙），随后跟着的是郑天挺、杨翼骧、于可、辜燮高、陈文林、来新夏等。

六、扫地出门

付筑夫，经济学教授，著有《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五卷本。1947—1983年任教南开，后任教北京经济学院，1957年错划为右派，文革中被扫地出门，睡到东楼二楼洋灰地上。

七、毒打

李琛，历史系党总支副书记，原党委书记高仰云之妻，怀疑历史上有三青团问题。文革中有数十人到甘肃武威去调查，花了学校两三万元，没有得出个结果，被抓到红反楼，遭到毒打，威胁拉到郊区活埋。被打得遍体鳞伤，死去活来，然后从红反楼扔出，已不能行走，只好翻滚回到东村小屋，每翻一身就惨叫一声。平常几分钟的距离，他滚了一个多小时，彻夜干呕，凄惨至极。

我于当年冬天，被天津大学八一三王冠杰，石家庄一学校杨感，天津南大附中齐宝珍三人联手，强拉到第一宿舍毒打，理由是：王冠杰毕业时，5门功课不及格，其父亲与校党委副书记翟家骏一定要分配到天大马列教研室，我提出开会，因此怀恨在心。齐宝珍对分配到中学教书，认为屈才。杨感毕业时，恰逢中央提出选派一批学生赴基层锻炼，然后委任为县长或县委书记。文革兴起，此计划落空。三人各有自己的私心，便以毒打来泄气。打手王冠杰手上着带刺的指环，打得一道一道的血印，头上、脸上都是。我胸部挨的拳头最多，顿觉五脏六腑如翻江倒海，头上也起了大包，脑袋剧痛犹如断裂。他们突然提出让我喝水。听说，此时喝水必得肋膜炎，未饮，他们又继续猛打。我的妻子王黎在窗外，看到打得越来越狠，毫无休止之意，便不顾一切地冲进楼内，拉开宿舍房门，大喊“打人啦”，喊声惊动楼上和楼下几十名学生，都来看热闹。打人者的激情有所冲淡。我的女儿魏晓静立在我的对面，至死不肯离开，打手们不认识她，便问她是否认识我。她说不认识。打手问：不认识，你看什么？她说我看他交代不交代，交代什么。由于其他人在场，打手们就没敢下毒手。

我因此大病一场，几乎丧命。从胸腔到腹腔一圈都疼痛，循环式的，胸腔前后，创伤无数。我倒在床上，昏睡不醒。夜间，大汗淋漓，被子全被湿透。我的妻子王黎半年没有上班，每隔两天早晨去医院挂号，回来后陪我到医院看病，然后再把我送回家，她下午再去医院取药，夜间，则监护我，替换被湿透的衬衣、衬裤，起码要换两次。日夜喝水吃饭，都是

她喊醒我，不然我会一直睡下去。她一两天到李七庄农贸市场买兔肉、田鸡之类，采取食疗法。

八、焚毁书籍

杨宗盘，数学系教授，被强迫用铁锹将旧英文数学书捣毁烧掉。其岳父钱道荪藏书甚富，焚烧一夜。

华粹深，中文系教授，满族王室人，从事戏曲研究，迫使他烧毁珍藏的从清末到新中国的唱片，烧了两天半。宫廷玉如意、顶戴、珍玩、字画、金银器等俱被抄走。

林树惠，副教授，参加编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如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等，协助郑天挺标点《明史》，并撰写论文多种。校外红卫兵直接烧毁中华书局版《二十四史》。

我是历史系讲师，被抢走书籍多种，烧毁了解放前辅仁大学印的《大学》、《中庸》、《论语》等教材。我为历史系资料室购买的解放区的报刊资料（包括敌伪的）一大堆放在主楼二楼一个角落，后来拉到造纸厂了。

九、强行搬家

几乎所有老教师都遭受搬家之苦，一些出身好的青年教师、职工等，强占老教授的房子，将老教授挤到一间小屋去住。如郑天挺被赶到一处背阴的9平方米的屋中。滕维藻一家五口被赶到只能放五张床的地方，什么东西都没有了。李何林，也是同样。吴廷璆家被赶入两间小屋，他的岳母没有地方住，只得回到安徽老家。杨生茂半个月搬了两次家，最后落户于北村的小屋中，其夫人被遣返到老家，老家村里没有户口，只得到她妹妹家里住。后在北村监督劳改。陈荣梯被历史系一位青年教师挤到一小屋中，经常受到侮辱。其他像温公颐、陶继侃、王玉哲、杨志玖、何炳林、李宜燮、王赣愚、周与良、邢公畹、朱维之、钱荣坤、鲍觉民、曾鼎和、傅筑夫、丁鸿范、丘宗岳、陈天池、陈仁烈、江安才、何启拔、刘晋年、钱荣、杨翼骧等家庭，非搬离，即压缩。凡教授无不被抄，或迁居或腾房。未搬出者，房屋均被压缩，住进他人。我的住房，“八一八”红卫兵看了几遍，因两间房子难以隔开，没有看中。旧沙发和桌子，因为太破旧，得以幸免。这种现象，北京没有发生，却是南开的“特色”。

十、抓人、拘留、审问

经济系讲师谷书堂被拉到一教学楼（时称“红反楼”）三层部分，强行拘留，不准回家，晚上睡在乒乓球台上，共18天。工宣队进校后，再次遭拘押，从中秋到第二年二月，经半年时间。同时被押的有教务长吴大任、副教务长滕维藻、外文系教授穆旦，晚上睡在化学系实验室的台子上。有时听到从红反楼二层传来的遭到毒打的人痛苦的呼喊声。因审不出什么，放谷回家时，用木棍打谷，木棍被折断了，可见用力之猛，谷因此得了心脏病。

十一、轮番批斗

这次批斗是轮番式的，而且时间很长，有的一两年，有的两三年，以我为例。1969年5月中旬，学校在马蹄湖畔的大礼堂召开大会，批判我、数学系系主任曾鼎和等三人。大会开始，主持人喊：“把大地主、大军阀、大资本家魏宏运押上台来！”依然坐喷气式，头

被押得很低。我的女儿也被拉来批判我，她的发言信是工宣队写的，因她年龄小，工宣队怕她害怕，中途退下，叮嘱她不要着急，一定要读完，“读完了，你爸爸就可以解放了。”当主持人宣读结论时说：“魏宏运出身贫农”，全场哗然。

解放了，我想就没事了，但我仍是“另类”，对我的批判没完没了。1969年10月17日，林彪发布一号令，称“紧急指示”，据此命令，南开大学于11月6日，向河北省定县疏散。第一日宿王庆坨，第二日宿霸县，第三日宿白沟，第五日宿徐水，第六日宿保定，第七日到达定县，沿途我仍然受到批判。1970年12月25日，毛泽东批示《关于部队进行千里战备野营拉练的总结报告》，指示要求全军利用冬季长途野营训练一次。

“大、中、小学（高年级）学生是否利用寒假也可以实行野营训练一个月。”南开大学组成拉练大军。我虽患坐骨神经痛，也被迫去拉练。据说历史系认为我要是不去，斗争就没有“靶子”了。第一天行程40里，夜宿杨柳青附近的“九一九”公社。第二天向徐水港进发，夜宿樊李杨，第三天到菜园杨各庄大队。第四天，向霸县岔河集方向进发，行程60里，夜宿南夹河大队，休整一天。30日向白沟进发，31日行程六七十里，夜宿八一公社。1971年1月2日，由徐水到满城梁庄，行程60里。3日向定县腰山南开大学学农战备基地进发。4日晚宿蒲上公社东北蒲。6日到8日，在蒲上休整了5天。一路上，我被批斗了3次，作了三次检查。当时称整党补课，批判的语言和语气没有变。他们认为以前对我批的都对，连“四一八”反标案整我也是对的。“四一八”案，是1970年4月18日贴出的小字报，内容是反对文革的，署名是“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此案惊动了北京高层。“革命派”锁定是我贴的。我说“四一八”不是一般问题，是现行反革命问题，反正不是我，走到哪里，我都敢说，而革命派说：“在四一八问题上，你站到敌人方面去了，长了敌人的志气，灭了自己的威风，干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四一八批判发牢骚，就是站在资产阶级路线上，四一八问题你必须讲清楚，免得将来再算后账。”不讲理到这种程度，还有什么可说呢。

我被专政的经历实在是太丰富、也太残酷了！历史系的一些革命者对我如此器重与厚爱，我真是想不通啊！

11月11日到30日，历史系多次举行批判修正主义大会。因为斗争会天天开，已经数不过来了，也记不清有多少次了。这里，仅举几例。

11月11日的会，某发言人讲：郑天挺、雷海宗统治历史系，来新夏把持中国近代史。雷和来都是市委有定论的人，魏还让他们上课。他们非常跋扈，把青年教师张宝训赶下台，排挤出学校。魏宏运对资产阶级不斗争，为雷海宗开脱，说雷在1955年批判胡适时说的话不是那个意思。来新夏自己吹嘘有多少卡片，魏也默认。魏宏运以系秘书系助理名义出现，赤裸裸是资产阶级统治。

1958年冲击旧教育制度，批判资产阶级分子，师生下乡下厂，走向社会。党的领导加强了，大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魏什么态度？大字报说某某剽窃抄袭，魏让取下来。郑天挺算什么权威？魏说权威就是权威。在开滦煤矿学习《矛盾论》和《实践论》，魏说不能代替哲学整个课程。

“魏宏运是资产阶级代言人，1959年魏受到批判，一直耿耿于怀，1961年又出现了反复。当时，以调整、平反为主，文科教材会，高教六十条，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历史的统治又加强了，雷等又上台放毒了……”

11月30日，历史系再次召开批判修正主义大会，摘几段发言人的批判：

“魏宏运吹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一贯的，1958年以前是资产阶级赤裸裸的统治，为所欲为，魏习以为常，喊雷海宗为雷老，说雷懂几种外国语，还要学生向郑老学习。”

“对1958年教育大革命冷淡、抵制。1961年贯彻刘、邓反动教育路线，是对1958年的反攻倒算，说那时对资产阶级分子简单粗暴了，给人家甄别平反，说就是一件事搞错了，也得平反，开了两次赔礼道歉会，在各种场合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喝彩，说中国古代史教师成龙配套，力量强。魏宏运召开雄心壮志会，让每个教师制定长期计划。魏宏运以5/6时间保证学习，让历史系党政干部也去听课。魏宏运在系里以召开行政会议的办法，贯彻工作计划，这是向资产阶级投降。资产阶级的意志通过魏宏运就成为‘命令’；郑天挺提出抢救遗产（指雷海宗的教学科研资料），魏就照办。郑天挺说文化史专题好，魏就设法登报宣传。魏宏运甘心做他们的工具，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代言人。魏1959年批判后没有变好，他认为对他的大字报十之八九是水分。”

十二、拉到农村劳改批斗

1971年9月21日，历史系“八一八”几位积极分子组织全校各系部分教师到霸县支援三秋，我被作为靶子拉去批斗，一路走，一路斗。我是南开唯一受这种待遇的人。所在村子牲畜缺乏，拉耩的任务就落在我的身上。清晨，往地里去，扛着耩，在地里耕地，黑土地，一踏一个深坑，很费劲，脚拔不出来，大汗淋漓，村里老乡给我水喝，看管我的人将碗打落在地。老乡替我找来布条，让我系上，又遭到训斥。因为身体严重缺水，我的宿敌痔疮因便秘而发作，坐骨神经疼也随之而来。每走一步都很难忍，咬着牙根，泪水往肚里流。我求人给我买膏药，没有人肯做。大家休息时，就批我。晚上收工，我又将耩扛回。晚饭后，又组织村民在一个十字路口批斗，他们因地制宜，将“黑帮分子”改称“富农分子”，老百姓说不出什么，就喊：“富农分子，我们怎么你啦？”批斗完，我还得写检查。真是苦了几位红卫兵，晚上睡觉还陪着我，进行监视，完全失去人身自由。

有一次改善伙食，吃饭时，我又遭殃，大家都快吃完了，我还在饥肠辘辘地垂首站立。校卫生院一位姓韩的大夫，边吃饭，边训我，让我站在一旁。我等待着他们要不要给我吃肉的决定。

秋收完毕，返校时乘船，分系分乘十几条船，我被从一条船上拉到另一条船上，逐船批斗。我当时想，得活下去，事实总有澄清的那一天。

回到家中，妻子说：“你怎么这么臭？”我说：“赶快换衬裤，磨死我啦！”等脱下衬裤一看，裤子上有碗口大一片层层脓血结成的嘎巴。半个月来，他们不曾让我身上沾过一滴水。

这时，家已不像个家，妻子被剪掉头发，白天不敢外出，天不亮就去上班，天不黑不敢往家里走，怕路上遇见红卫兵。那时，从她所经过的东方红仪表厂回家，途经红旗路，有一段路两旁没有建筑物，是一片野草。她突然听到狼嚎，转眼间狼到了路边，与她正碰面，躲已经来不及了。幸好有人骑一辆破车，由北向南，嚓啦嚓啦地过来，狼跑掉了。总算捡了一条命。孩子魏晓明上学要罚站，听到“狗崽子站起来的”吼声，就得站着。红五类进教室走前门，“狗崽子”走后门。我每天心里像刀割一样难受。当时流行着一种反动的血统论：“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红五类趾高气扬，不可一世，被视为“黑五类”、“黑七类”的，受尽歧视和折磨。

十三、为学生洗刷厕所

从霸县劳改归来后，对我的专政，从未放松。我尝到了各种专政的味道。我挂着“黑帮”牌子在大中路一带扫地。有一天，正在新开湖边的图书馆门前扫地，几个红卫兵让我脱鞋，说鞋中藏有钱。我被拉到校东门内大车房熬胶，自己烧柴，自己搅锅，供全校红卫兵贴大字报用，来取胶的人，任意喝骂。1966年12月，党委书记臧伯平、副校长娄凝先也被打成叛徒拉来熬胶。我真想不到他俩和我在一起。三个人都不说话，因为是他俩开始在历史系点名批我的。随后红卫兵又把我拉到第13楼学生宿舍，不准回家，让我打扫厕所，刷得已很干净，他们戏弄我说：“不行。”我得遵命继续刷。晚上同他们睡在一间屋内。红卫兵何兆之炫耀自己抓叛徒的能耐，到北京抓地质部长何长工，到南京抓南京市长管文蔚，并说他向中央文革写了信，揭发了“伍豪启事”，冀图立功，不可一世。后来何长工来南开，记得何兆之的名字。这时，红卫兵至上，谁都听他们的命令，受害者敢怒而不敢言。

十四、诬为历史反革命

吴大任，数学专家，教务长，1980年为副校长，曾留学英、德。文革时受到极大的摧残和磨难。游行、打、砸、抢、抄、抓都经过了。军宣队审他时说：“你是特务，是历史的，也是现行的。”还成立了吴大任专案组，结论是“未发现重大问题”，吴不服，1978年彻底平反。

十五、现行反革命

1970年4月18日，学校出现了反标，称“四一八”案件。历史系，文革中高手多，捏造了一份作案路线图，提出了作案的三个条件：一、此人为西北人，因用的铅笔字是西北某院校某报的；二、平日爱用剪贴方式制卡片；三、不满文化大革命，用画像的方式来锁定作案人是魏宏运。我多次受审，又被拘留，一位女学生刘淑珍把我押到宿舍审问，室外站着两个公安人员，我说：“你们认为我是，可把我送入监狱。”这位刘女士，毫不讲理，一次我正在卫生院看病，躺在床上针灸，把我从床上揪起来，说：“不准看病。”从东站的铁路工宣队负责人训斥我，说：“你就是现行反革命，越看越像。”他们动员左邻右舍来揭发。历史系学生和兆之还伪造了一个证明，说四一八那天魏贴出反标后，走到天大，到德才里刘克华家中走了一趟。这种陷害，使我身心受到最大创伤，经过一段时间，破案了，我才得以解脱。

十六、里通外国

凡是和外国是有联系的，都被锁定为里通外国。高等学校知识分子的环境是工人不理解的。不少学者热情归国，却遭到了不幸。一位同志听工宣队员讲副教授以上83人，都是故人，属敌我矛盾。

何炳林、陈茹玉夫妇留学美国，均为化学系教授，发明离子交换剂，办起了工厂生产，影响深远，改革开放后，夫妇均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文革前，因家中有收音机，受监控，文革中受尽磨难。挤进他家住的青年实验员，不断制造事端，还勾结公安局将其大孩子拘留一段时间。

陈荣梯，化学系教授，留学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获化学博士学位，后在芝加哥大学进行低温研究，从事原子能委员会的研究工作。回国后任教南开，从事热力学、动力学、配位化

学及络位化学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文革时，受尽折磨，被扣上特嫌帽子，各种暴行都尝试到了。翻身后，他将自己所受的痛苦，都讲了出来。

吴廷璆，教授，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毕业，曾在八路军总部敌工科工作，历任历史系系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天津史学会会长和名誉会长、《历史教学》主编、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参议委员会常委等职。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史卷》亚洲部分，著有《吴廷璆史学论集》。文革中，工宣队发现一张他在日本时和日本友人的照片，就被扣上里通外国的帽子，每天到主楼接受审查，有一张大标语，诬吴老是“大叛徒、大汉奸、日本特务”，贴在邻居许政扬家的外墙上，面对着吴宅，后被关入牛棚近一年。不堪侮辱，曾企图自杀以表示反抗，得救未遂。

年轻的教师和党政干部很聪明，隐瞒了自己的海外关系，免遭此劫。文革结束后，因为有海外关系，可以加分，纷纷讲了出来。

十七、南开校园特务成堆成串

1968年12月下旬，校军工宣传队清理阶级队伍第一阶段结束，在大操场举行大会，工宣队主持，宣传部干部，原为历史系教师郭××在大会上发言，点名批判何锡麟、娄平、滕维藻和我，并称“南开大学叛徒成堆，特务成团，反革命分子成串”。当场揪出历史反革命杨翼骧和蒋哲时。杨抗战初逃出北平赴西南联大继续就读，行至武汉，路费花光了，就报考国民党游击训练班，约半年，就是这经历，被戴上了历史反革命帽子，文革中被专政。蒋年轻，未发现什么问题。这次大会，全校人心惶惶。

1968年8月20日上午，工宣队2400人进入南开，21日上午11时后又进入1200人，共3600人。进驻历史系的工宣队是天津火车站东站铁路工人和三配件厂工人，是8月24日进入的，为总团的三团四连。他们把教师分为5个组，即忠字组、立新功组、斗私批修组、坦白从宽组、抗拒从严组。我、郑天挺、巩绍英和于可是三敌一霸，这是副教授梁××概括的，自然未被编入。我被关进主楼一间阴暗的教室，与我同住的不分性别，一共关了八九个人。我每日在教师和学生中被轮流批斗，一个年级又一个年级，一个班又一个班地挨批斗，斗完了就得写交代材料。一天，我实在写不出，就在室内仅有的那点空地上来回走。恰巧遇到系团总支书记王明江巡视，他就指责说：“魏宏运，你还在表演。”巩绍英回敬了一句：“各有各的表演。”牛鬼蛇神中也有积极分子，每天打小报告。工宣队认为这人很可靠。凡是被关押的人都必须排队到食堂吃饭，边走边唱牛鬼蛇神嚎歌：“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敌人。我有罪，我该死。人民应该把我砸烂砸碎，砸烂砸碎。我是牛鬼蛇神，要向人民低头认罪。我有罪，我改造，不老实交代，死路一条。”

我受不了这种侮辱，拒绝排队买饭，工宣队只好默许，我和他们一起在主楼大厅为工宣队设立的饭摊上买饭吃。关于嚎歌后来才知道，是周巍峙被迫谱成的。

十八、活人展览

文革中只有杭州和南开历史系施行活人展览，让受害者向观众当面说出自己的罪行。南开展厅设于主楼226室。受害者有我（走资派）、郑天挺（反动学术权威）、杨翼骧（历史反革命）、来新夏（历史反革命）、陈文林（为美军当翻译）、辜燮高（摘帽右派）、李深（国民党三青团），给每个人设一牌位，写上“罪状”，贴在墙上。桌上还摆着抄家抄来的实物。全市来参观的达20余万。只是给我留了点面子，没有拉去出席。我就在展厅旁边一室中享以蹲牛棚待遇。

化学系教师李美同，认为毛泽东思想可“一分为二”，因言获罪，遭全校批判。

以上还不能概括所有的暴行，只能说是概述。

◇ 迫害至死者

据不完全统计，迫害至死者有 21 人，现举例如下：

陈天池，化学系分析教授，系主任，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所长。1946 年赴美，在路易斯安那大学主修有机化学，副修数学，获博士后，又去科罗拉多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员。1950 年回国，195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 年被选为南开大学党委委员。文革初期，被诬为“特务，里通外国，身心受到极大摧残，在厕所上吊自杀。

吴恕求，化学系青年教师，留学苏联，妻子为俄籍，被诬为苏修特务，服毒自杀。

林震宇，外文系青年教师，被诬为反革命，不堪侮辱，跳楼自杀。

卞岑年，生物学教师，被强制到大苏庄砖瓦厂劳动，溺水而死。

戴笠生，生物学教授，被批斗而死。

孙兆录，经济系讲师，参加远征军为美军当翻译，遭批斗，在主楼跳楼自杀。

许政扬，中文系讲师，1958 年遭到莫须有的批判，得了抑郁症，从此一蹶不振，他在文革一开始，即投河自杀。

高仰云，原校党委书记，臧伯平授意为所谓 61 个叛徒成员，遭迫害，到天津大学跳湖自杀。

张国忠，化学系学生，卫东红卫兵的二把手，被隔离审查，割断肠子而死。

张喜福，河南人，父子二人均为铁路工人，哲学系讲师，卫东红卫兵总部负责人之一，坐牛棚、审查，有人认为将其打死，最后被投入地下粪坑而死。其穿的鞋子放在臭水沟旁，因为撬开下水道井盖，必须用一铁器，手是搬不动的。而且井口很小，他的身体又高大，是谁下的毒手，一直是个谜。全校都为这一冤案叹息。

黎国彬教授的岳母，住东村平房，东村居民红卫兵认为老嫗过的是资产阶级生活，将她的厨房各种调料如盐、碱面、辣椒、姜面等拌在一起，吐上吐沫，强迫老嫗喝掉，老嫗不堪侮辱，乃跳卫津河自尽。

文革史是一部血迹斑斑的血泪史，是史无前例的，若以秦始皇焚书坑儒和清初文字狱相比，则是小巫见大巫。

近期，已有不少整人的人相继写出忏悔文章。我期望南开园里，那些逞能的人，甚至使他人致残致死的人，能拿出勇气，诚恳地反省，洗刷自己的污点，不然晚上睡觉也不踏实。

这是一个道德问题，在四人帮横行的“黑暗”时期，走错了路，总结这一历史教训，对历史负责，于国于民是有益的。

（作者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 来源：《炎黄春秋》2014年第4期

~~~~~

## 【往事非烟】

### 大水冲了龙王庙：南开大学红卫兵与“伍豪事件”

• David •

1970年新年不久后，被看管了近两年的“卫东”红卫兵的第二把手“忠”，“躺在被子里，用刮胡子的剃刀，将肚子划破，将肠子拉出，一段段割断了，最后因大量出血而死去”。

——这是小说《文革中的大学生》的一段话儿，读过让人毛骨悚然。

小说还写道：率先掀起批判南开大学党委书记臧伯平的“卫东红卫兵的头头出生于中央高干家庭，她有通天的路子”。

尽管这两个人在小说中都没有交代具体姓名，但对南开大学历史有了解的人都知道，高干家庭出身的女同学叫周少华，父亲是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周荣鑫。

“忠”的情况相对模糊，不过参考南开大学魏宏运的文章《南开大学文革往事》所记：“张国忠，化学系学生，卫东红卫兵的二把手，被隔离审查，割断肠子而死。”可知，小说中的“忠”就是张国忠，自杀方式也是真实的。

张国忠为何绝望地自戕？周少华何以通天？其背后是一段大水冲了龙王庙的残酷历史。

南开大学在“文革”中的表现，是北大和清华望尘莫及的，因为两件惊天的大事都在发生这里。

一件是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通过翻查历史资料，挖掘出了“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因此被定罪为“叛徒、内奸、工贼”，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所谓革命元老被残酷批斗。“八一八”红卫兵因此被中央文革大加表扬，一时间声名远播。

在此情形下，作为对立面的造反派“卫东”头领，周少华和张国忠明显感受到了竞争的压力，大辩论甚至武力冲突之外，他们也努力翻查材料。皇天不负有心人，1967年5月初，他们终于在旧报纸中发现了“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示”。

作为周荣鑫的女儿，周少华当然知道伍豪就是老校友周恩来昔日的化名，于是5月12日致信文革小组的戚本禹。5月13日，周少华与张国忠被戚本禹、关锋接见。对此，江青曾说：“5月12日夜，收到周荣鑫的女儿周少华给中央文革来信，说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

示，为首的是伍豪，要求同我面谈。”5月17日，江青写信给林彪、周恩来、康生，信中并附寄了这个启事。

尽管“伍豪事件”还有另外的版本，如李文卿在《文革中的许世友》中写道：1968年5月4日，许世友携带南京造反派清查档案时发现《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启事》，之后将材料送到北京。《吴法宪回忆录》中写道：“江青把杨成武和我叫到她那里，拿出一包材料对我们说：‘这些都是周恩来的材料，但是现在你们不能看，你们只要知道有这些材料就可以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些材料是许世友送来的，里面装的就是著名的‘伍豪启事’”。

根据文革时期的翻档案、旧报纸以及各种交代材料看，两种叙事应该都成立。从时间的先后顺序来说，南开“卫东”红卫兵还在先。

在刘少奇以及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已经被打倒的情况下，置身于政治旋涡中的不倒翁周恩来很是紧张。据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工作三十多年的赵炜回忆，此事发生后，“邓大姐让我把西花厅的工作人员都召集到一起，包括秘书、卫士、司机和厨师。邓大姐向大家简单讲了讲这件事，让（赵）茂峰去北京图书馆借来1931和1932年上海出版的几种报纸，我们大家就不分白天黑夜地找起来”。经过几天的繁忙，终于在1932年2月20和22日的《申报》上找到“伍豪启事”的声明和否定声明。

紧张的周恩来一面在江青的来信上批示：“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一面于5月19日写信给毛泽东：“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八日的伪造启事”，“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一面制定了1931年至1932年的《大事记》，一并送毛泽东阅；之后又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抓叛徒”问题的通知》，其中第一点就强调：“对一个人作出是否‘叛徒’的结论，是一件严肃的政治问题，是关系到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问题，必须经过周密的调查，采取慎重的态度。不要根据不充分的，未经核实的材料，自行宣布某人为叛徒。不要轻易公布材料。”

尽管周恩来有惊无险地度过这一关，但心中的怒火和愤懑之情是可以想见的。随后在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中，作为此事重要参与人的张国忠被看管起来，自感没有希望的他以血腥的方式自杀。现在没有证据表明是周恩来亲自下令看管张国忠，但相信天津或南开大学革委会中的大小头目们，不会放过这个为总理也为昔日杰出校友报仇雪恨和请功的机会。

至于“卫东”红卫兵的另一头目周少华，因为父亲居高位，仅在1972年8月3日，与父亲周荣鑫一道，被周恩来与李先念、纪登奎、汪东兴谈话，然后就此事经过写了《汇报我和张国忠通过戚本禹向中央报告国民党反动派报纸捏造总理黑材料的经过》，算是一个背书，结束了这段“大水冲了龙王庙”的政治事件。

同一历史事件的两个当事人，境遇竟然如此天壤之别，也是有些令人唏嘘的，感谢《文革中的大学生》这部小说，真实地再现了南开大学的那段历史，也再次诠释了学术意义上的文史互证。

□ 原载《华夏快递》2020年06月15日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